

【论 文】

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及其影响

娄贵品¹

摘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是中共批判蒋介石“国族”观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其要点是：蒋介石的“国族”观是法西斯主义（血统论）；蒋只承认中国有一个民族，这是捏造单一民族论，是否认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违反了孙中山的意见；蒋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批判则使蒋介石“国族”观越来越“接近”大汉族主义。大陆解放以前，中共的批判影响很小。解放初，梁聚五和费孝通在贵州批评蒋介石的“国族”观时，对其内容都接受了贵州省主席杨森的概括——“国族同源论”，至于评价则完全沿袭了中共的批判，梁还加上他对杨森民族政策的批评。这种将杨森的概括和中共的批判相结合，甚至加上对杨森民族政策的批评的模式，为20世纪60年代贵州主要少数民族布依族和侗族史志中的批判话语确立了典范。这一典范在此后的布依族、侗族史书中得到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梁、费确立的典范在不少涉及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论著中亦被沿用。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共的批判对蒙古族族别史或蒙古地方史也有重要影响。但主要是陈文所谓的捏造单一民族论、法西斯主义血统论等影响较大，有的论著在单一民族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族主义理论”或“少数民族取消论”及梁对杨森民族政策的批评，杨森的概括则没有任何影响。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民族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史方面的专著，及研究《中国之命运》的论文，在涉及蒋介石的“国族”观时，亦受到中共批判的影响。

关键词：蒋介石 “国族”观 中共 杨森

蒋介石“国族”观主要体现在《中国之命运》中，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始于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随着中共在国共内战中胜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在大陆得以确立，中共的批判成为权威论断，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受影响的不同领域对中共批判话语的选择各有侧重。鉴于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就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及其影响作一系统梳理和研究。这也是一次“重新审视探究历史本事与前人的历史认识之间的联系及区别”²的尝试。希望能够增进今人对相关历史的真实面貌的认识。

一、

就笔者所见，蒋介石的“国族”观，最早在蒋1942年8月27日在西宁的演讲中就已经明白表达出来了。蒋介石在演讲中说：“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

¹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讲师。

² 桑兵：《理解本意，寻绎演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6页。



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¹

在《中国之命运》初版中，蒋氏写道：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少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²

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已改为“多数宗族”。

1943年9月14日，行政院向各省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的代电。蒋介石在密电中希望国人“了解与注意”：“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世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³

1944年1月1日，《中国之命运》增订版出版，扉页上有陈布雷写于1943年12月15日的一段说明，谈到蒋介石对全书重加校订，第一章为重要增订点之一：“本书自今年三月十日开始发行以后，印刷至二百余版。兹经总裁就全书加以校订，交正中书局重印增订版。其重要增订点：（一）为第一章对于中华民族成长之历史说明，有所增益。”⁴具体表述如下：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散布于帕米尔高原以东，黄河、淮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之间。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启族姓的分别。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但其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斑斑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之内而有大小宗支之分。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亲戚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

……

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纪录。此共同之纪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在此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宗族往往在文化交融之际，各回溯其世系而发见其同源。即如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汉书考其远祖实出于夏后氏。东北的女真与西藏的吐蕃，是鲜卑的子孙，而晋书魏书考其远祖皆出于黄帝轩辕氏，我们再稽考周书、辽史、及文献通考以为推求，则今日之汉族与藏族即由此流衍而来。至于我国今日之所谓回族，其实大多数皆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回教徒，故汉回之间其实只有宗教信仰之分，与生活习惯之别而已。总之，我们的各宗族，实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一个种族。⁵

在表述上虽仍使用“多数宗族”、“各宗族”，但在论证各宗族同源时，只列举了汉满蒙回藏五族，似乎是在论证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而不是论证中华民族同源。

以上便是蒋介石关于“国族”观的阐述。其中，《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国之命运》

¹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载《福建训练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3年10月。

² 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3月普及本三二〇版，第2页。

³ 《抄发委员长蒋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代电》，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1293期，1943年。

⁴ 参见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4年1月增订版，扉页陈布雷的说明。

⁵ 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4年1月增订版，第2、8~9页。



初版中关于“国族”观的论述，与陶希圣有关，但并不完全来源于陶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还包括陶著《中国民族战史》。《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的代电》、《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明确阐述“同源论”，则是采纳任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修改意见的结果。如果说，“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这一层意思可以概括为“同源论”，而“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这一层意思可以概括为“融合论”的话，那么，蒋介石的“国族”观实际上是包括了“同源论”和“融合论”的¹。虽然蒋介石在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的代电中只阐述了“同源论”，《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同源论”的论述也得到了加强，但“融合论”的篇幅并未减少。

早在 1942 年，即有人认为“国族”是孙中山特创的名词，用以指称具有“一民族一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这一特点的民族²。但据王尔敏先生探究，刘向在《说苑·臣术卷》已使用该词，其义当指齐国全体³。不过，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意义上的“国族”概念，确实是孙中山最早使用，指中华民族。蒋介石多次引用孙中山关于国族主义的阐述，用过“国族”一词，时人也以“国族”概称其在《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曹树勋解释“国族（nation-state）”一词时说，“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谓之国族”，并引述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相关言论：“国父确认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总裁谓‘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然后得出结论，“所谓国族者，在中国，实为与‘民族’或‘大中华民族’之范围，完全相同。”⁴至于“国族同源”、“国族一元理论”、“国族同源理论”等用语，就笔者所见，都是杨森用来概括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的，并非蒋介石本人所使用的概念。

二、

《中国之命运》初版在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1943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才突然把《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共宣战书”大张旗鼓地进行大批判。其中，被授意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陈伯达所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⁵。陈文批评说：“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

¹ 参见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载《二十一世纪》2012 年 6 月号。

² 毛起鹄，刘鸿煊编：《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 1942 年版，第 2、3 页。

³ 王尔敏著：《今典释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6 页。

⁴ 曹树勋编著：《边疆教育新论》，正中书局 1945 年 1 月初版，1945 年 11 月沪一版，第 77 页。

⁵ 参见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该文原载《开放时代》2008 年第 6 期，此处引自未删本。



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¹陈文的要点是：蒋介石的“国族”观是法西斯主义（血统论）；蒋只承认中国有一个民族，这是捏造单一民族论，是否认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违反了孙中山的意见；蒋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为中国的法西斯始于1920年代²。而批评蒋介石或国民党政权对国内民族推行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亦有先例。在《中国之命运》出版前，吕振羽就斥责说：“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前和抗战后，在国内，都一贯的在推行其最反动的法西斯大民族主义”³。所谓“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固然强调血统，但与法西斯无关。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有“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表述，但在同年1月至8月的三民主义演讲中的民族主义部分，孙中山又说，“民族就是国族，……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所以，主张单一中华民族论的正是孙中山，说蒋介石“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捏造“单一民族论”，“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并得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结论，与史实不符。不过，公布陈文当天（7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要求各根据地除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⁴；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文多次被收入相关书籍出版，所以影响甚大。

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批评说：“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⁵实际上，蒋介石未称蒙、回、藏、苗等为边民，而是将它们与汉族一起称为宗族，且承认都是中华民族的宗支。但周仍将蒋的“国族”观定性为大汉族主义，并指责其不承认蒙回藏苗为民族，而不提蒋介石视国内所有民族（包括汉族）为宗族的事实，使蒋的“国族”观更“接近”大汉族主义。陈文的“欺压国内弱小民族”则发展为“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1944年《中国之命运》增订版出版后，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译出了一个摘要，并附有内容简介，其中提到“新版中改动的不多，也不重要，某些明显的事实错误改正，显然只作了很小的努力来回答共产党人提出的有根有据的批评。在谈到汉族扩大对其他民族的控制时，原来用的‘同化’一词，在新版中改成了‘联合’。……关于他的种族路线，即中国的所有各不同民族（藏族、蒙古族、汉族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委员长不仅没有为他的立论提出根据，而且力图使他的立论固定下来。举例说，他荒谬地谈到，古老的传说说匈奴人是纯属传闻的黄帝的后代，而黄帝又是汉人的设想的祖先之一⁶”。所述不确，“汉族扩大对其他民族的控制”与原文不符，且根据原文，初版中的“同化”是被改成了“扶持”，而不是“联合”。所谓“古老的传说说匈奴人是纯属传闻的黄帝的后代，而黄帝又是汉人的设想的祖先之一。”原文为“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汉书考其远祖出于夏后氏”。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指责说：“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⁷。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宗支改为“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意在凸显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反动”的，使蒋介石的

¹ 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0日），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4、5、9页。

² 参见张文涛《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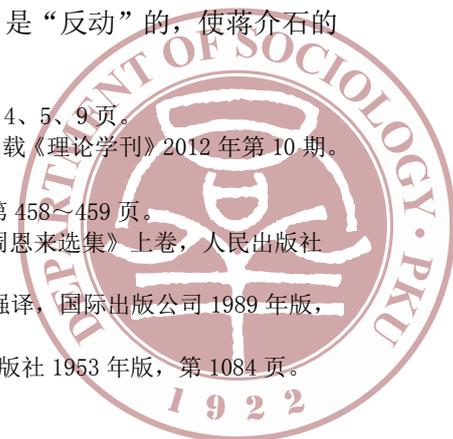
³ 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光华书店1941年版，第18页。

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459页。

⁵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⁶ （美）埃谢里克（Esherick, J.W.）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赵仲强译，国际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8页。

⁷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



“国族”观与中共指控的大汉族主义完全相符。“歧视和压迫”也变成“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中共方面的批判到此并未结束，但之后的批判在论调上实际都未超出以上批判的范围，所以这里不再涉及。

应如何看待以上批评呢？相关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关于陈伯达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李杨先生评论说：“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辞，更多的是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¹。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时期的民族话语，文明超也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都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民族话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国内各族称为‘民族’，并以此指责国民党否认国内各族的‘民族’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可以削弱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各族的政治支持，这对于地处西北蒙古、回族聚居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讲非常重要”²。这些总结，对我们分析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也是适用的。很明显，以上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实际上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选择以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作为批判蒋介石或国民党政权“国族”观的主题，指责蒋介石在民族认识和民族政策方面违背孙中山，执行错误的民族政策，意在说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开历史倒车，理应打倒；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不具备政治合法性和正统性，理应下台，并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族的政治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批判在国共内战未决出胜负之前，影响非常有限。随着共产党全面胜出，以上批判遂被大陆学术界视为最权威的学术论断而长期沿用。

1946年3月，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认为，“吾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世界上号称有五千年历史之古国，慨自清季以还，内政腐败，朝廷漠视边疆，弃同荒徼，境内各宗支族，互相歧视，以致列强乘隙觊觎，领土日削，国父怒焉忧之，倡导革命，重视国族团结，民族主义居三民主义之主要地位，谆切昭示，凡中华国族，不分汉满蒙回藏苗夷任何宗支族，均应一律平等，总裁继承遗志，手著《中国之命运》，亦反覆叮咛国人，中华民族领土内，所有之宗支族，同出一源，均宜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其说精湛确凿，最为有据，深得全国人民之公认，良以吾国国境内各宗支族，依据人种西来说，均来自帕米尔高原，初沿黄河汾河渭河流域发展，嗣因生殖日繁，人口众多，乃分散于四方，又以自然环境之不同，而稍异其生活方式，然黑发黄肤，一望而知为中国人，固无俟乎主张中华民族多元论之人种学家之穿凿附会，妄为分析，聚讼纷纭，呐呐不休也，至于民国初元五族共和之说，挂一漏万，亦不适用，自应依据国父总裁国族一元论，予以矫正。”³之后又说：“实则中华国族，同出一脉；黄肤黑眼，姊妹弟昆，四百兆人，无二类型。所不同者，只冠服装饰、婚丧礼俗、有较微之差异耳。我国民政府主席蒋公，高瞻远瞩，有鉴于此；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云：四海之内，各地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相结以累世婚姻。证明国族同源，实为不刊之论。森钦崇不已，曾辩香斯说”⁴。

在当时人看来，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是与世界人类起源问题相关联的。单元论者认为世界人类发源于一个共同祖先，他们便从世界各处去寻觅这个人类发祥的“圣地”。多元论者认为人类出于多源⁵。单元论之一是人类起源于巴比伦。拉克伯里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杨森所谓的“吾国国境内各宗支族，依据人种西来说，均来自帕米尔高原，初沿黄河汾河渭河流域发展，嗣因生殖日繁，人口众多，乃分散于四方”，即是依据拉克伯里的观点。这是清末民初中华人种、文明

¹ 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第46页。

² 文明超：《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第54、62页。

³ 杨森：《〈边铎月刊〉发刊词》，载《边铎月刊》创刊号，1946年3月1日。

⁴ 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自序》，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所1947年7月出版。

⁵ 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光华书店1941年版，第6页。



西来诸说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该说自 1903 年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附和者众，甚而还进入了传播公共知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但到 1920 年代，该说遭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批驳。大概在 1930 年代中叶，便从中国历史叙述中销声匿迹了。¹杨森将拉克伯里的主张视为国族同源论的渊源，与其喜好追慕新潮²应有关系。

孙中山从未主张国族同源，蒋介石的“国族”观虽然包含同源论，但还包括融合论。所以，国族同源其实也是杨森自己的主张，杨将其源头指向孙中山和蒋介石，不过是拉大旗当虎皮，挟人自重，以示其想法来源于党国先进和党国领袖，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从而更好地按自己的思路开展工作。因此，杨森在贵州大力宣传和实践“国族同源”论³。

本来，将蒋介石的“国族”观概括为“国族同源理论”，是不尽准确的⁴。但由于解放初梁聚五和费孝通在批判蒋介石的“国族”观时，都接受了杨森的概括，所以后来学术界多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或国民党政权的“国族”观就是“国族同源理论”。

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杨森将蒋介石的“国族”观概括为“国族同源”见诸文字始于 1946 年 3 月，而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则始于 1943 年 7 月，所以，《中国之命运》初版出版以后至大陆解放以前，中外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主要是沿袭中共的批判话语，都没有提到“国族同源”。

1943 年，埃德加·斯诺说，《中国之命运》“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不很准确的解释，以支持一种大汉族主义的理论。”⁵1945 年 10 月，回族干部马凤舞指责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施行大汉族主义。他们不称回回为一个民族，只认为是一个宗族。”⁶1945 年 9-10 月间，金耀洲的空公馆里常聚集好多人，他们议论着形势也议论着少数民族该怎么办。有一次，吴化民曾拿着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一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说：“蒋介石说我们是大汉族宗下的分支，光天化日底下卖的是民族同化论。”⁷吴氏将毛泽东批判的蒋介石或国民党政权“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发展为“蒋介石说我们是大汉族宗下的分支”，“我们”指少数民族。

1950 年 8 月，因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而欢呼鼓舞、曾对蒋介石“国族”观及其在贵州的实践深怀不满的贵州苗族知识分子梁聚五说：“他（按：即蒋介石）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国境内，只有‘宗族’与‘支宗’，并没有‘民族’。主张中国境内有‘各民族’的，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蒋著中国之命运）。在他的推论，汉族，固是黄帝的子孙；就是满蒙回藏苗夷各族，也是黄帝的子孙。这简直是赤条条的‘大汉族主义’者。而陈立夫、张旭光之流，竟根据蒋介石的错觉，而发出‘中国民族同源论’的邪说，以淆乱人心，妨害孙中山先生‘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推行。”“最可耻的如杨森等，捧着蒋氏意旨，执掌贵州政权，对于苗夷民族，特别施以镇压。……他们的目的，在迫使苗夷民族，同

¹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载《历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² 参见赵可《追慕新潮的杨森》，载《民国春秋》1999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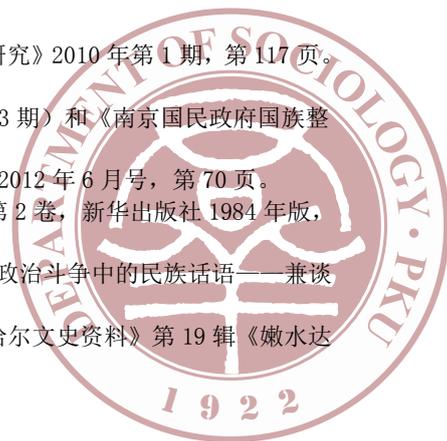
³ 笔者有《杨森主黔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制定》（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国族整合的构想与实践——以杨森主政时期的贵州为例》（未刊稿）讨论这一问题。

⁴ 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载《二十一世纪》2012 年 6 月号，第 70 页。

⁵ 埃德加·斯诺著；新民译：《一九四三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斯诺文集》第 2 卷，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5 页。

⁶ 马凤舞：《回民的出路》，载《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29 日。转引自文明超《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载《开放时代》2010 年第 6 期，第 63 页。

⁷ 卜林：《达斡尔人参加抗日斗争事迹》，齐齐哈尔史政协文史办公室编：《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 19 辑《嫩水达斡尔人》，编者 1989 年，第 171 页。



化于汉族，以消灭其语言文字服装。及一切生活习惯。”“各县县长，都照着杨森的指示，禁止苗夷民族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字，穿自己的服装，行自己的风俗习惯。”¹“‘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源于陈伯达文。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中只论述了汉满蒙回藏同源，没有提到苗夷。梁先生视蒋介石的“国族”观为“中国民族同源论”，明显来源于杨森的概括。至于说张旭光“根据蒋介石的错觉”得出“中国民族同源论”的邪说，与事实不符²。而且，各民族同源跟“大汉族主义”也不能划等号。但梁氏所述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³。

1951年，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费孝通在贵州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在‘中国之命运’里创同源论，认为中华各民族是一个民族，把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或‘国族的宗支’，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⁴费氏1939年曾因不赞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而与顾氏有过争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能说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当然更不赞成“国族同源论”。因此，费氏所述不是一般的应声之论，但也无法排除受到中共批判话语的影响。比如他仍然有意无视蒋介石把汉族称为宗族，将汉族视为国族的宗支的事实。费氏发言中还提到杨森在贵州推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其所谓国民党在《中国之命运》中创同源论的说法，无疑来源于杨森的概括。2003年，费孝通回忆说：“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时期，政策上是不分什么‘民族’的，认为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一个民族，其他的都是汉族的‘宗支’。”⁵“其他的”指少数民族。但既然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汉族不是宗族，不知费先生此时所说的汉族与中华民族是什么关系。

梁聚五、费孝通之所以专门提到蒋介石创“民族同源论”或“国族同源论”，是因为贵州是蒋介石“国族”观得到大力推行的惟一边疆省份。又因杨森是蒋介石“国族”观最忠诚的推行者⁶，所以，梁、费在批评蒋介石时，也连杨森一起批评。梁、费在批评蒋介石的“国族”观时，将杨森的概括和中共的批判相结合，梁还加上对杨森民族政策的批评，这为20世纪60年代贵州主要少数民族——布依族和侗族的简史简志中的批判话语确立了典范。这种典范又在此后的布依族、侗族史书中得到延续。

1958年，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外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在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⁷1963年出版。丛书中涉及蒋介石“国族”观的有《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和《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

《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反动的同化政策。蒋介

¹ 梁聚五著：《苗夷民族发展史（草稿）》，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1集，编者1982年版，第133页。

² 1941年10月，张旭光总结说，关于中华民族含义的解释，约有二义，“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几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进，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此派以熊十力氏主张最力”。（张旭光著：《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文化供应社1942年版，第1页。）所以，即使张氏真持“中华民族同源论”，也不是来源于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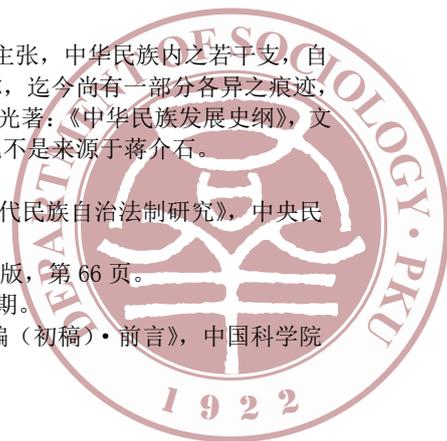
³ 梁聚五的批评在贵州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笔者另文讨论。

⁴ 《中央访问团费孝通副团长发言》附件，第13页。转引自李鸣编著：《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462页。

⁵ 费孝通著：《费孝通在2003年：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⁶ 参见《杨森主黔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制定》，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⁷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前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



石在其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集历代反动民族政策之大成，捏造出所谓‘国族同源’论，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少数民族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大宗小支’。”¹这是在费孝通讲话的基础上，加上对杨森的批评。所谓“同化政策”，是指杨森在贵州的民族政策。《黔南布依族简介》（初稿）除将上引第一句改为“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压迫、军事征剿的同时，还实行了反动的同化政策。”其余则完全沿袭²。《布依族简史》将整段话改为：“国民党当局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他们不准少数民族妇女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不准布依族姑娘留辫子，不准讲本民族的语言等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集历代反动民族政策之大成，提出所谓‘国族同源’论，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少数民族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大宗小支”。”³这段话在《布依族史》中得到完整保留⁴。所谓“他们不准少数民族妇女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不准布依族姑娘留辫子，不准讲本民族的语言等等。”是指杨森在贵州的所作所为，来源于前引梁聚五所述，只是没有点杨森的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族志》则说，“到了民国后期，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则极力鼓吹‘国族同源’论，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⁵

《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写道：“在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统治下，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更加严重的压迫和歧视。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反动的‘国族同源论’，不承认有少数民族，颁布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实行民族同化政策。”⁶仍然是在费孝通的基础上，加上对杨森的批评。1986年出版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认为，“国民党政权还泡制了‘民族同源论’，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明确提出要消灭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⁷对杨森的批评更为具体。

《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说：“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强制同化政策提出了反动的理论根据，不承认国内有少数民族，把蒙、回、藏、苗、瑶、黎等民族看作仅是风俗习惯不同的汉族的‘宗族’。”⁸这段话在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苗族简史》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苗族简史》¹⁰中得到完整沿用。《中国苗族通史》在《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的基础上改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制造了理论依据。他公开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满、蒙、回、藏、苗、瑶、黎等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¹¹2008年版《苗族简史》又在《中国苗族通史》的基础上改为：“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动同化政策提出了理论根据。他不承认我国有少数民族存在，把满、蒙、回、藏、苗、瑶、黎等民族看作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¹²

《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说：“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根本就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蒋介石公开讲‘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叫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

¹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47页。

²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黔南布依族简介》（初稿），编者1982年版，第37页。

³ 《布依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⁴ 黄义仁著：《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⁵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按：《中国之命运》出版时蒋介石不是总统。

⁶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39页。

⁷ 本书编写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⁸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132页。

⁹ 参见《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¹⁰ 参见《苗族简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¹¹ 伍新福著：《中国苗族通史》（下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¹² 《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249页。



¹。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被改成“中国只有汉族”，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宗支被改成“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均涉及蒋介石的“国族”观，其中苗族、布依族和侗族都是贵州的主要少数民族，在杨森主政时期被统称为“苗夷”。杨森主张“国族同源”，针对贵州苗夷众多的情况还提出汉苗夷同源，倡导汉苗通婚，应该说苗族是杨森民族同化政策施行的最主要对象。而编写苗、布依、侗、水、仡佬五个民族的简史简志的任务都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承担²，但不知何故，只有《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和《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提到了杨森“国族同源论”的概括，《苗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却未提及。

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初稿全部付印，是为广泛征求意见，再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限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这个愿望也就无从实现。³

到20世纪80年代初，周春元批评蒋介石“在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叫嚣‘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国境内，只有‘宗族’与‘宗支’，没有‘民族’，否认有民族存在，实质上即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同化论。”⁴这一批评几乎完全来自梁聚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将杨森的概括与中共的批判相结合，再加上对杨森民族政策的批评来对蒋介石“国族”观进行批判的论著，不再局限于布依族、侗族等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的相关史志，也有不少是涉及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

1993年，祝起源认为，尽管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制定官方文件、发表演说中，都声称要继承“国父遗教”，遵守“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提倡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实际却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蒋介石本人在民族问题上就违背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建党初期关于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宗旨。他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早期的宣言中使用“民族”一词改为“宗族”。说什么“我们的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并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还说“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在这种“国族同源论”的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及其属下的各地方政府机构，在民族地区制定和推行了许多反动的政策和措施。⁵

1994年，黄光学认为，蒋介石并不遵循孙中山关于中国各民族平等结合和扶植弱小民族的主张，而是秉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和强制同化的政策。蒋甚至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提出所谓“国族同源论”，把汉族称为“国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认为他们仅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⁶2001年，孙秋云认为，蒋介石“主观上并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其《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蒋介石提出了‘国族同源论’，把汉族称为‘国

¹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第52页。

²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后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版。

³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出版说明》，《蒙古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⁴ 周春元：《略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历代统治政策的演变》，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第102页。

⁵ 祝起源：《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载田继周等著《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引自《祝起源藏学研究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⁶ 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该书2005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署名“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相关表述无变化。参见该书2005年版第57页。



族’，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认为他们仅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¹。2007年，沈红认为，蒋介石主政时期主张“国族同源论”，称汉族为“国族”，称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为“宗族”，他们只是汉族的“大小宗支”²。孙、沈所述直接源于黄著。

2006年出版的《中国自治州的民族关系》说，“民国时期特别是蒋介石集团统治期间，基于一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国民党当局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就否认中国有多个民族的存在，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鼓吹‘国族同源’论。”³

加拿大学者徐乃力也认为，“蒋中正偏向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氏宣称居住在中国的人民来自同一祖先，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⁴。

除了上述少数民族及国民政府民族政策方面的相关论著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对蒙古族族别史或蒙古地方史也有重要影响。不过，与对布依族、侗族等的族别史或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史的影响不同的是，陈文所谓的捏造单一民族论、法西斯主义血统论等影响较大，有的论著在单一民族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族主义理论”或“少数民族取消论”，梁聚五对杨森民族政策的定性——“同化”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杨森的概括则没有任何影响。

1963年版《蒙古族简史（初稿）》只说蒋介石“对内加紧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镇压蒙汉各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⁵未具体提到蒋介石的“国族”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第一版，1979年1月第二版《蒙古族简史》（修订本）未涉及蒋介石的“国族”观。1979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首次涉及，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更进一步推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捏造出一种单一民族论，根本否认蒙古民族和国内其它少数民族的存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荒谬地宣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这种民族血统论不是蒋介石的创举，而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他们就曾以这种怪论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⁶1990年出版的《内蒙古近代简史》认为，“为了给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和宣传‘国族主义’、‘中华国族’之类的观念。到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国民党抛出了‘中国单一民族论’这一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理论。蒋介石在他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明确提出，中国各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按照这样的理论，中国各少数民族既然不具备民族的资格，仅是汉族的分支，那么，它们当然也就不具有实行自决或自治的资格和能力了。由此可见，国民党人执政后所奉行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大汉族主义的同义语而已。国民党当局在它21年的统治期间，对国内少数民族执行的始终是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和压迫政策”⁷。2002年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下册）认为，“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存在，提出中国各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的所谓中国单一民族论。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压迫和同化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实质。”⁸

1985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以所谓单一民族论和国族主义

¹ 孙秋云：《20世纪我国大陆的民族认同及政策作用浅议》，收入《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汇编，中南民族学院2001年打印稿，第249页。

² 沈红著：《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注①。

³ 金炳镐主编：《中国自治州的民族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⁴ [加拿大]徐乃力：《近代中国“民族政策”之演变》，载李国祁主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1页。

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蒙古族简史（初稿）》，编者1963年版，第129页。

⁶ 刘景平，郑广智主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⁷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⁸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编：《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下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



理论企图强迫同化和消灭蒙古族。1943年发表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这一理论和盘托出。蒋介石索性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的事实，而说中国各民族是‘同一血统之内’的‘大小宗支’。

‘我们的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种族。’这里不仅显露出国民党在理论上的荒谬无知，而且赤裸裸地暴露了它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本质。”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蒙古族简史》²对此完全因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蒙古族简史》³、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蒙古族简史》⁴则只在1985年版的基础上改了两个标点。2006年出版的《中国自治区的民族关系》认为，“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抛出所谓单一民族论和国族主义理论，企图强迫同化和消灭蒙古族等各少数民族。”⁵

1987年，乌兰少布认为，“1943年前后，中国少数民族取消论和中国单一民族论发展到顶点。这一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平生得意之作《中国之名运》”⁶。1991年，裴小燕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为其实施大汉族主义压迫政策寻找依据，提出了所谓‘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单一民族论’。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把它们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各民族只是同一血统之内的大小宗支’而已的谬论，为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否认蒙古民族存在的对蒙政策作了最好的注脚。”⁷

2001年，《蒙古族通史》（下）认为，“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是只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汉族），其他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干脆否认蒙古等少数民族作为单独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⁸2008年，《喀左蒙古族史略》认为，“国民党执政后，继续执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蒋介石甚至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均为汉族的‘大小宗支’。”⁹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民族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及研究《中国之命运》的论文，在涉及蒋介石“国族”观时亦有受中共批判影响的。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认为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藉口中国各民族无种族、血统的区别，宣扬宗族理论¹⁰。1994年，刘会军认为《中国之命运》“歪曲中华民族的历史，宣扬法西斯主义血统论”¹¹。199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认为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正确主张，触及到了承认中国“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但蒋介石国民政府却背离了这一思想¹²。199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民国卷）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根本背离了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中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对内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而推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政策。”“在对国内民族的认识上，国民党歪曲中国国内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其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国民党否认中国多民族的存在，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均

¹ 本书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375页。

² 《蒙古族简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377页。

³ 《蒙古族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⁴ 《蒙古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⁵ 金炳镐主编：《中国自治区的民族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⁶ 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271页。按：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署名刀京版、召存信、余海清等15名少数民族干部的联合发言《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文章批评“龙云公开否定多民族的存在，宣传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是严重违反我国宪法的反动论调。”乌兰少布的“少数民族取消论”，或许与此有关。

⁷ 裴小燕：《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初探》，《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⁸ 《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⁹ 李天龙主编：《喀左蒙古族史略》，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¹⁰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9页。

¹¹ 刘会军：《〈中国之命运〉论析》，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第37页。

¹²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8页。



称为‘宗族’”，蒋介石“否认除汉族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国民党政府虽反复宣称“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实际上却是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或称为强迫的民族同化政策¹。200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指导思想上，南京国民政府把蒙、藏、回等少数民族称为‘宗族’，把民族问题看做是‘边政’问题，并未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² 200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册《论》认为《中国之命运》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歪曲性的阐述。蒋介石宣扬“大中华民族”的观点，用血统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的历史，抹杀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以掩盖国民党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实质³。

诚如黄兴涛教授指出：“以往，不少民族史著作在谴责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观时，一般只提他视各少数民族为‘宗族’，而不提他同时也视汉族为‘宗族’这一事实，有的论著甚至明确说他视‘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为宗族’，这就不太严谨准确和实事求是了。”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后人一味直接或间接地沿袭中共对蒋介石“国族”观的批判，而不认真查阅原书。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将《中国之命运》误为一篇文章，直到2005年再版都没改过来，可见编者始终未看过《中国之命运》。孙秋云的表述完全来源于《中国的民族识别》，因此也将《中国之命运》误为一篇文章。部分论著虽然对《中国之命运》做了征引，但很少真正看过原著，多是利用二手资料，而且几乎全都断章取义。

【论 文】

从伊朗到新疆 ——美国中东战略阴影下的“椭圆”

马钟成⁵

2014-05-23 14:1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40523106442_5.html

¹ 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

² 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48页。

³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册《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⁴ 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原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2月创刊号，见郭双林、王续添编：《中国近代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8页注[89]。

⁵ 马钟成，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